

【文化杂谈】

□王佐良

在世界所有的文字中,汉字是最优美的。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它们时,从大自然获得了灵感,也从大自然汲取了最具有美感的形迹和图像。不仅如此,他们还从自身创造的事物中,例如劳动工具和茅舍村落中,提炼出美的元素,将它们刻画为用于记录、表达的符号。古代先民们从游牧转变为聚落居住,捕猎种植,饲养制器,举行节庆和祭祀活动,生产劳动的复杂和社会生活的丰富促使他们改进记事、核算、标识的方式,原始的刻画符号便产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安徽蚌埠附近的双墩古墓中出土了七千多年前的六百多个刻符,这些大多刻在陶碗圈足内的符号,生动地表现了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狩猎、捕鱼、网鸟、养蚕、种植等等,仿佛一幅幅连环画。”可贵的是,那些鹿、猪、鱼等动物符号,线条之简练,比例之精巧,形象之生动传神,让人不禁怦然心动。刻画它们的决不是一双笨拙的手,而是一双双灵巧的艺术之手,它们显示出高度熟练的技巧、令人惊奇的抽象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强烈的美的感

汉字之美

受力和表现力。在这样的刻符基础上形成的甲骨文,便具有了旷古绝世的美感。

从刻符到甲骨文,大概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史传沮诵和仓颉“发明”文字,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把各地人们已经用了几千年的符号收集起来,为皇室和贵族统治的需要而加以整理和改进,赋予它们公告宣示、表情达意等功能,并使它们形体上更美观优雅,更具贵族气派。比如甲骨文的“人”,一个双臂下垂、弯腰前倾的人,是那时候的人在贵族面前毕恭毕敬的姿态。从甲骨文到金石篆,汉字经历了从“文”到“字”的革命性发展,《易》、《诗》等文学作品标志着汉语言文学正式诞生,然后是百家争鸣,各种理论学说纷纷登场,迎来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谁能说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不是从我们祖先刻画符号开始的呢?

文字的创造是人类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进步的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甲骨文,它不像希腊文那样创造出24个字母,拼出人们称谓事物的声音,形成词汇,

它是用极其简练和概括的手法,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概念的、可见的还是纯粹内心的)用单个简洁的符号表示出来,这些符号具有特定的含义,能用以组成文章、记事存档、公文告示、书信往来、抒情表达、理论述评、标识戳记,也就是说,具有文字的一切功能。因此,汉字具有独特的简洁之美。

汉字之美,还在于它举世无双的刻画、书写之美。至甲骨文,出现了为王室服务的专业书法家,不仅一笔一画的刀功手法让人赞叹,而且结体布白的清晰概念使一片片刻满文字的甲骨文展现出气象万千的整体美。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书法,或挺拔峻峭,或雍容典雅,有天稟元气之象,令人震撼。古代文字书写的变

化常常和朝代的更迭紧密相连。殷商之后,西周大量使用青铜器,金文出现繁荣,金文其实已不仅是“文”,而且有“字”,汉字极大地丰富了。相比甲骨文,金文凸显雍容华贵,结构繁复,这与王室贵族讲究奢靡豪华、繁文缛节的生活方式相映衬。从甲骨文到金石篆,汉字经历了从简到繁的成长

嬗变。然而,终有一天,它会回归到简。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汉字第一次实现了统一,也开始了由繁到简的转变。隶书的出现,使汉字平民化了,为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自此,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兢兢业业,刻意创新,汉字书法之美始现千姿百态的绚丽景象。追求书法之美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书法大家如群星闪耀,为世人所仰望,“一字难求”、“墨宝”成为书法艺术珍贵的代名词,人们用尽一切华美绚烂的词藻赞颂书法作品,“纤纤兮如新月出于天崖,落落乎犹众星列于云汉。”(孙过庭《书谱》)从上层阶级到平民百姓都刻苦学习书法,留下了很多“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佳话。

近来有人提倡恢复繁体字,我甚以为不可。汉字从甲骨文的简到金石篆的繁,历经千年,此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向简回归,汉字简化既顺应时代,也符合今天数字化的大趋势。汉字的真美在于简,网络时代的汉字将更加简化并愈益展现其无穷的魅力。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翁斋语语】

李白的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朗诵的神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给我的感觉是,老师在那一刻进入了角色,李白就是老师,老师就是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交代送

【翁斋赏诗】

友情可贵
在乎诚

——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于冠深

别朋友的地点。黄鹤楼是名胜古迹,在别的地方送别,提不提关系可能不大。在这样的地点送别,点出来似乎能多一点纪念意义。“烟花三月下扬州”,是讲送别朋友的时间和朋友前往的地点。三月以“烟花”冠之,三月就不再是一般的抽象数字,一下子花团锦簇了起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都是作者送别朋友之后的伫望所见:孤帆渐行渐远,渐行渐远,直到消失于碧蓝的天空。然而,作者并没有转身离去,他仍然站在那里,眼睛大大地睁着,又使劲眨了一眼,也许连脚跟都提了起来,惜乎除了天边的浩浩江流而外,别无他见了。“问君能有几多情,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者,友情之谓。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上学的时候,还学过李白的另两首写朋友之间送行的诗。一首题曰《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也是他送朋友,但不是写当面送别,而是写了寄去,或更有可能的是遥寄其意——

杨花落尽子规啼,
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另一首是写朋友送他,题曰《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主要表现了作者对于朋友的无限依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主要表现了作者对于朋友的深切关心;《赠汪伦》一诗,则主要表现了作者对于朋友的充分信赖。依恋、关心、信赖、一往情深,全都出于至诚。诚乃友情的纽带。出于至诚,是李白对于友情的态度,也是友情之所以可贵的根本所在。的确,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出于至诚,绝然写不出如同李白所写的这样感人至深的诗句。

以我的观察为据,友情对人而言,意义非同小可。人们通常所关注的,是朋友之间看得见摸得着的帮助。而事实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仅仅是志同道合前提下相互间的倾诉、交流、关爱、提醒、祝愿、问候、同喜同乐、同伤同悲等等,便有如案头温暖的灯盏、窗外扶疏的花枝、天际皎洁的弯月,予心灵以莫大的慰藉,可谓弥足珍贵。

人生在世,亲情和爱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资格跟亲情和爱情并列的,我以为就是友情了。人生好比在大海里游泳,亲情、爱情和友情是明显可感的浮力。就像几何学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一个人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其祸福通透的大体局面。

李白的优点很多。读《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应首先学习他对于友情的那一番至诚。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学界往事】

□智效民

拙著《民国老校长》问世后,记者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民国期间的大学校长那么多,你为什么只写了八个呢?”

为此,我替自己找了三个理由:“第一,面对学术腐败,我拒绝申请科研经费,只能依靠有限的资料进行研究。第二,我的兴趣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方面,对于其他类型的人物兴趣不大。第三,因为精力有限,我不敢对更多校长有所涉猎。”

其实这种辩解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即便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也有被我遗忘的人物,比如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就是其中一位。

杨振声,字金甫,后改今甫,山东蓬莱人。他早年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他与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主要参与者。

“五四”运动之后,他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资格赴美深造。在美国,他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他历任武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教学之余,他创作并发表了

被遗忘的大学校长杨振声



《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玉君》等多篇白话小说,其中中篇小说《玉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

1930年,在蔡元培和胡适的推举下,他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走马上任后,仿效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聘请闻一多、梁实秋、张道藩、黄敬思、黄际遇、汤腾汉、庄德寿、赵太侔、曾省之、杜光埙、程乃顾、宋春舫、游国恩、赵少侯、沈从文、黄淬伯、方令孺、薛彩凤、李方琮、梁启勋、傅鹰、郝更生、宋君复、高梓等著名

学者前来任教。一时间青岛大学名流云集,英华荟萃,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教学科研蒸蒸日上。

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有所回忆。他说:“民国十九年夏天,今甫奉命筹办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我在此时才认识他。有一天他从容不迫的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无可抵抗的力量。”

梁实秋到了青岛以后,看到这是一个风光旖旎、冬暖夏凉、人情淳厚的地方,觉得显然与其濒临大海的地理位置以及“孔孟之乡”的人文环境有关。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这里没有类似北京琉璃厂和南京夫子庙的去处,因此稍微有点遗憾。

当时梁实秋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每逢星期六要参加校务会议,会后学校“照例有宴席一桌”。作为山东人,杨校长喜欢饮酒并擅长划拳。届时,他总要打开一坛30斤的绍兴老酒,“挽袖挥拳,音容并茂”,与大家开怀畅

饮。许多时候,他们还要拉上唯一的女教授方令孺,凑成“酒中八仙”。此情此景,实在令人羡慕。

然而,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和天津的学生组织南下请愿团赴南京请愿。青岛大学的学生不甘落后,也开始罢课并拦截火车前往南京。为此,杨振声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开除几名学生运动领袖。学生不服,不仅撕毁学校布告,还包围校长公馆要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这些学生还把国民党区党部当做大本营,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青岛大学教务长张道藩带领警察逮捕了几名学生运动的领袖,结果反而使学潮进一步扩大。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杨振声只好引咎辞职,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青岛大学。

从表面上看,杨振声的辞职是学生运动所致,但是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据梁实秋说,当时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是杨振声的老同学。杨“属于名士类型,与官场中人不可能沆瀣一气”,但何思源却是个“善于做官”的人。因此梁实秋认为“杨振声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与省方不洽”,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读史札记】

□王春南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有一部很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此书洋洋60多万言,评论的历史人物,粗粗数了一下,多达近百人。其中苏轼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有十多次,而且都是差评。

司马光《资治通鉴》写到五代,不可能提及北宋的苏轼。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提到苏轼也无妨,稍带一下就行了,似用不着不厌其烦地评说。看来他对于苏东坡其人,有一肚子话要说。

王夫之对苏轼的从政生涯下了四个字评语:“擅权纷乱”。他说,西汉周勃、灌婴诽谤贾谊,说他“擅权纷乱”,这四个字,安在贾谊头上是诬蔑,用来评说苏轼却是平允、恰当的。周勃等人攻击贾谊的话见于《史记》,原话是,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诚然,不能给贾谊扣“擅权纷乱”的帽子,但给苏轼就能扣了吗?擅权者,专权、揽权也。一部“二十五史”,写到的擅权的宰相

王夫之为何贬低苏东坡

或权位相当于宰相的人以及外戚、宦官等,真是数不胜数,却没有读到过曾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的苏轼专权、揽权之史实。《宋史》对苏轼的从政经历就不是这么评价,书中赞扬了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萃,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就是说,《宋史》是用“政事精明”四个字来概括苏轼的宦海生涯的。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苏轼是值得敬重的才士。王夫之不这么看,他鄙薄苏轼的为人。他说,苏轼与唐朝的元稹、白居易以及其弟苏辙,都是“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撇开其他人,单说苏轼。固然他喜欢饮酒吃肉,但他是有节制的。他在《东坡志林》中说:从今天开始,吃饭不超过一杯酒,一碗肉。有贵客来,三杯酒、三碗肉,只能减不能增。有人请我吃饭,我预先告诉这个标准,如超标,我就不再赴宴。再说,苏轼饮酒吃肉不是

吃公款——在宋代,用公款吃喝是犯法的事。所以,苏轼因酒肉而丧志的事是没有的。至于说苏轼因游玩而放纵自己的感情,因讲究穿着打扮、收藏珍宝、沉醉书画而丧失操守,那也都是没有的事。

王夫之认为苏轼倡导“邪说”,他的《读臣论》这类文章抹杀了君臣之义,混淆了忠奸之别,但我查《苏东坡全集》,没有收《读臣论》,似苏轼没有写过此文。我拿不准,特意请教南京师范大学原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他查了东坡全集,也没有找到《读臣论》。他又请文学院古文献专业的一位老师查一查,回答是:“船山所论,应为韩愈《读臣论》,非苏轼,亦非名《读臣论》,故苏集中无是。”王夫之凭印象批评苏轼,把韩愈的《读臣论》误作了苏轼的作品,又误《读臣论》为《读臣论》。印象有时是靠不住的。

苏轼提携秦观,王夫之很不满。他说,苏轼将秦观等人提拔到

重要位置,其害更甚于王安石,因为秦观等人都是放纵不受约束的人。苏轼在徐州任职时,秦观拿了一篇自己撰写的《黄楼赋》去见他,苏轼认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特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也认为秦观的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看来不是苏轼一人欣赏秦观,王安石也赏识。《宋史》说,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提携这样一位有才气的文人,有什么错呢?

王夫之对宋代以前数十位帝王的评论,大多很深刻,有卓见。只是他评论文人,包括东晋王羲之,唐代韩愈、“元白”(元稹、白居易),北宋“三苏”(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明代宋濂等等,往往失去分寸,批评、指责不能让人信服。是否他对文人特别严苛呢?

指责人,给人扣帽子,而又不拿出证据来,这可能是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一个明显的缺点。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